

Salerno, J. T., Dorobat, C. E., & McCaffrey, M. C. (2021). Monopoly as a ‘culture-history fact’: Knight, Menger, and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17(6), 1049–1064.

熊越 译

本文仅供研究使用，不一定代表译者观点

作为“文化-历史事实”的垄断：奈特、门格尔与制度的作用

约瑟夫·T. 萨勒诺 (Joseph T. Salerno)

卡门·埃琳娜·多罗巴特 (Carmen Elena Dorobat)

马修·C. 麦卡弗里 (Matthew C. McCaffrey)

摘要：在关于《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的文献中，弗兰克·奈特的垄断价格理论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我们认为，奈特接受并完善了卡尔·门格尔及其追随者们的垄断价格理论。奈特强调了作为背离完全竞争的必然结果的垄断与作为偶然或“文化-历史事实”的垄断之间的区别。在后一种情况下，对潜在竞争的强制性制度障碍塑造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集，并为识别垄断收益提供了关键方法。这种对奈特贡献的描述有三个好处：它恢复了对垄断价格的制度决定因素的关注，而不是主流对市场摩擦和不完全的强调；它为认真研究生理制度的门格尔主义垄断价格理论开辟了道路；它为正在进行的关于奈特在经济学中的位置的辩论增添了新的证据和细微差别。

关键词：卡尔·门格尔；弗兰克·奈特；垄断价格

1. 引言¹

垄断价格理论研究竞争条件和非竞争条件下的价格形成，以发现这些条件对个人、公司、市场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因此，它是我们理解市场经济中定价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讨论垄断基本方面的主流经济文献受到限制，很少有研究强调垄断的制度背景和制度含义。这种疏忽源于垄断理论的历史发展——作为一个有些分散的工作主体，专注于造成垄断价格的各种摩擦和市场不完全，被建模为与完全竞争等纯理论基准的偏差。在这种观点中，制度考虑充其量只能起到次要的、间接的作用，主要受限于产生或消除摩擦或其他不完全（如交易成本）的特殊变量（Hudik and Bylund, 2021）。结果，当代理论忽视了在垄断收益的形成和识别中一般价格理论和制度的直接而关键的作用。

本文通过重新考虑弗兰克·奈特对垄断主题的贡献，探索了这种研究的另一种选择——一种将因果-现实主义价格理论与根据历史和制度的分析相结合的研究。奈特提供了一种几乎被忽视的垄断价格分析，它直接与制度研究相联系，以解释“关于一个私有财产、自由交换的社会组织的理论趋势的确切含义”及其意蕴，即“实现这些趋势所必需的条件”（1964, 174）。奈特的分析植根于对一般价格理论的动态理解以及——同样重要的——对市场竞争的制度-历史障碍的认识。当奈特试图在他的完全竞争模型中提炼出“交换关系”的本质时，他能够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一方面，作为对纯粹的和无法实现的竞

¹ 我们感谢编辑和两位匿名审稿人对论文早期版本的建设性批评。

争理论模型的几种背离（这是现实世界“数据”的必然结果）之一的垄断，另一方面，作为偶然或“文化-历史”事实的垄断。在讨论他的观点时，我们使用“制度”来表示“人为设计的【正式和非正式】约束，这些约束构成了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互动的结构。【……】与经济学的标准约束一起，它们定义了选择集，从而确定了交易和生产成本，从而确定了从事经济活动的盈利能力和可行性。”（North, 1990, 97）。奈特（和我们）讨论的焦点来自于对垄断价格的纯经济解释的局限性和范围；这些解释必须辅之以了解制度在垄断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反过来又限制了市场竞争的“影响强制性权力的获取和使用的制度”（Greif, 2005, 728）。

奈特对垄断和竞争的看法比后来的评论家们所承认的更为微妙，主流理论将奈特对竞争的贡献纳入其中的方式忽略了他思想的重要方面。²特别是，奈特反对这样的观点，即市场体系中的摩擦和不完全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改变了解释市场价格形成的因果关系。他声称，

经济理论的大部分内容都必然涉及因果之间的滞后，而通过效仿力学中加速度模式的概念并没有摆脱掉这些滞后，更不用说这些概念在“摩擦”的有害类比（它涵盖了经济思想中的诸多过错）之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Knight, 1964, xxii; 强调为原文）。

奈特的根源是受卡尔·门格尔启发的垄断价格传统——奈特对该传统非常熟悉，并且，该传统在1921年《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出版时达到顶峰——通过了解这一点，可以最好地勾勒出奈特的原创性和重要性。门格尔主义和奈特主义的观点强调，理论不可能区分自由竞争下的竞争性价格和垄断价格，从而识别自由市场上垄断收益的存在。只有当强制阻碍或排除潜在竞争时，垄断收益才有可能。然而，这种方法已经在大量研究中消失了，这些研究剖析市场“摩擦”或不完全的所有可能组合——通常与完全竞争的基准相比——来理解垄断。

因此，结合门格尔主义者对奈特关于垄断的观点的重新思考突出了三个重要的见解：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勾勒出制度在垄断发展中的作用，并可以将垄断价格理论恢复到其在经济学中的原始范围和重要性。通过回顾奈特对垄断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我们无法在纯交换理论的抽象平面上画出垄断价格-竞争性价格的区分，而只能在框架和约束现实世界交换的制度事实和条件中发现它，从而避免像市场摩擦或不完全这样的误导性概念。其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奈特还填补了门格尔主义传统的空白，并提供了一个与制度进行真正互动的分析基础，一些批评家仍然认为奥地利学派的工作缺乏这一点（Hodgson, 2019）。

² Stigler (1957, 11) 认为，通过垄断竞争理论，奈特的完全竞争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为针对它的广泛反应铺平了道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奈特对待竞争和垄断的方法并不像斯蒂格勒所说的那样“节制”。对于奈特来说，“对于我们理解对人的行为的任何方面的监管来说，价格理论是必要但不充分的”（Emmett, 2009, 149）。Hodgson (2001) 认为，奈特是继凡勃伦（Veblen）之后最伟大的美国制度主义者之一，而 Asso and Fiorito (2008, 72) 认为，虽然奈特的著作不是制度主义的，但他们通过拒绝“行为主义和本能-习惯心理学”来破坏制度主义的统一性。对于 Emmett (2013, 122)，奈特的观点是“正确的经济学科学介于……制度历史和伦理之间”。

第三，我们的讨论为正在进行的辩论，即关于奈特在经济学史上的位置（无论是他的奥地利学派影响还是制度主义影响），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Hudik and Bylund, 2021）。

2. 垄断价格：潜在竞争而非完全竞争

卡尔·门格斯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奈特在其著作的序言（Knight, 1950）中称其为“划时代的”——标志着垄断价格理论的独特传统的开始，该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入主要的美国经济学教科书。³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J. B. 克拉克（J. B. Clark）、菲利普·威克斯蒂德（Philip Wicksteed）、赫伯特·达文波特（Herbert Davenport）、弗兰克·费特（Frank Fetter）和弗农·蒙德（Vernon Mund）进一步发展了门格尔对垄断的见解。奈特与这些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关系密切，并受到他们的影响，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倾向于“门格尔主义经济学而不是马歇尔主义经济学”（Emmett, 2013, 5）。他的观点与维塞尔的韦伯式主观主义产生了共鸣（Yu, 2002），他将博士论文——后来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的“方法论和理论重点”（Emmett, 2020）以及对垄断理论必不可少的“动态分析的重要性”的准确表述归功于克拉克（Raines and Jung, 1988, 141）。奈特还与达文波特（曾是他的博士生导师）以及费特建立了个人友谊，费特强调考虑垄断的个体方面和制度方面，而不是奈特认可和钦佩的公司规模和成本等狭隘的技术因素（Fetter, 1937, 97; Knight, 1937）。

事实上，在他在芝加哥的职业生涯中，奈特的一般价格理论仍然“更接近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而“战后芝加哥学派的价格理论显然是马歇尔主义的”（Emmett, 2015, 6）。奈特确实与奥地利学派发生过争论（参见 Boettke and Vaughn, 2002; Cohen, 2003; Emmett, 2007），但没有一个是奈特与他的芝加哥学派同行之间在方法论上发生的那种根本分歧（Emmett, 2006, 2009）。⁴正如 Yu (2002, 2)所说，“对比奈特对奥地利学派作品与其他非奥地利学派作品的评论，可以公平地说，奈特总体上接受了奥地利学派的做法，并且同情奥地利学派的许多立场。”重要的是，奈特与门格斯的因果-现实主义方法有许多相同的元理论假设（Mäki, 2004），⁵这反过来又影响了他对竞争和垄断的讨论。

门格斯的垄断价格理论可以用四个相关且部分重叠的主张来描述。首先，**垄断价格的形成受一般交换规律的支配，不需要单独的、不同的理论。**对于门

³ 例如，参见 Henry Seager (1908)、Frank Taussig (1911)、Lionel Edie (1926)或 Raymond Bye (1934) 的教科书。另见 Salerno (2003, 2004)。后来的门格尔主义者 Vernon Mund (1933, 76)认为，“门格尔对垄断贸易的逻辑分析是一项原创性的工作。因此，经济学家一直区分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基本性质。”

⁴ 与芝加哥学派其他人的分歧是因为他们的理论要求他们“系统地推翻奈特的假设，而奈特用该假设来巩固他对价格理论与捍卫自由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理解”（Emmett, 2015, 6）。

⁵ 例如，参见奈特对“静态”和“静止”状态的讨论（1964, 142–143, fn.1），其中他批评了马歇尔主义“任意抽象作为一种方法论手段”的方法。奈特似乎反对精确的、理想化抽象的马歇尔主义方法，其观点类似于奥地利学派使用的非精确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抽象（Long, 2006, 7–9）或 Mäki (2004, 322)所说的“通过隔离来省略”。另见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1964, 15, 71, 和 166）中对马歇尔主义的类似批评。

格尔主义者来说，垄断条件下的价格解释是统一的、因果-现实主义的价格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在竞争环境还是在垄断环境中，当交换的共同利益耗尽时，就会建立均衡价格，这会在定价过程中带来瞬时静止状态（Salerno, 2003）。门格尔观点的关键在于，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在概念上是不可区分的，也就是说，它们不能在分析中分开，也不能独立于彼此和所研究的复杂现实来定义。相反，两者都由交换理论来解释：

所有财货经济交换的一般原则（根据该原则，双方都必须从交换中获得经济利益）在垄断的情况下保持其有效性不受损害（Menger, 1976, 211）。

这不同于自门格尔的时代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论述，其中现实世界的价格处于完全竞争和垄断之间的竞争程度等级（scale of competitiveness）⁶之上，价格理论的作用是理清哪些情况最好被建模为竞争，哪些情况最好被建模为垄断或寡头垄断。例如，对于 Chamberlin (1949, 3–4)，价格是由竞争力量和垄断力量的组合决定的，并且需要结合两种力量要素的混合价格理论来区分在发挥作用的不同因果关系。以这种方式，垄断竞争理论解决了继承自古诺（Cournot）和法国工程师们的马歇尔主义完全竞争模型的逻辑矛盾。然而，它接受完全竞争作为理想的市场情况和自由市场上区分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标准：在没有其他独立标准的情况下，垄断价格是根据竞争性价格定义的，反之亦然。

因此，对于主流来说，当需求在竞争性价格之上缺乏弹性时（即它比在完全竞争下完全弹性的需求曲线更缺乏弹性时），就会形成垄断价格。该基准迫使理论家将现实世界中的所有摩擦、约束或不完美——它们偏离了完全竞争的无法实现的理想，并允许生产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价格或供应——定义为垄断。这些大类的摩擦或不完美成为形成垄断和垄断价格的必要条件，并描述了许多个体概念，包括卖方数量、集中度或垂直整合、自然稀缺性、效率差异、产品差异化、调整滞后、要素固定性、交易成本、不完全信息、偏见和许多其他因素（参见例如，Tirole 1988, 1）。这些条件在现实世界市场和各种制度环境中普遍存在，因此该框架内的所有市场竞争必然导致更高的（根据定义，垄断的）价格和更低的产出水平。在这种观点看来，制度安排可以消除产生垄断收益的不完美和摩擦，⁷但即便如此，“不完全竞争均衡与产能过剩以及消费者福利的损失有关”（Tsoulfidis, 2009, 36）。

垄断理论的后期发展仍然集中在确定自由竞争下的产业条件，这些条件通过影响生产者影响价格或供应的能力来区分垄断价格。产业组织领域已经使用

⁶ 我们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这一表述。

⁷ 到 20 世纪 40 年代，芝加哥学派基于方法论及其对立法者的不切实际拒绝了垄断竞争（Stigler, [1949] 1983; Friedman, 1953），但提出回归完全竞争模型和部分均衡——基于其预测能力（Tsoulfidis 2009）。垄断竞争方法的“不切实际”或“无法证明”的假设也受到结构-行为-绩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方法的支持者的批评（Mason, 1939; Bain, 1972, 82–91）。然而，SCP 倡导者采用了更广泛的市场结构定义作为起点，其中包括公司认为与其业务政策相关的所有因素（Monteiro and Foss, 2018）。Dixit and Stiglitz (1977) 在一个形式化的数学模型中重申了张伯林早期的所有见解，带来了第二次垄断竞争革命，该革命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学中获得了特别的认可。

这些价格理论原则来支持市场竞争分析，研究市场结构如何为面临很少或没有竞争的公司决定定价决策和战略互动，使他们能够提高价格和减少产量（参见 Besanko et. al, 2017, 167–170）。这种洞察力也支持了将公司作为一种治理结构的方法，调查哪些治理结构允许更高的效率和垄断收益（Bickenbach et al. 1999, Joskow 1991）。最近的研究着眼于市场和资源条件下的竞争格局（Peteraf and Bergen, 2003），其中结合了“需求侧（即消费者需求）和供给侧（即能力等价）要素”（Monteiro and Foss, 2018）来阐明垄断和竞争之间的区别。

然而，对于门格尔主义者来说，**市场需求曲线是决定垄断收益可能性的关键因素**。第二个主张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由竞争（或门格尔所说的“真正的竞争”）并不需要存在众多的竞争者，每个竞争者都面临着完全弹性的需求曲线，或其他某种理想化的市场条件（Menger, 1976, 223–224）。**所有竞争者**都面临着负斜率的需求曲线，并拥有通过限制自己的供给来提高价格的“市场力量”，经济计算向垄断者和竞争者都揭示了符合其最大总收入或利润的价格。然而，与众不同的见解是，在自由竞争下，生产商无法通过限制供应来提高价格。这是因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竞争者的需求曲线比垄断者——高于与出售可用财货的全部库存一致，或与完全利用生产该财货所需的特定要素（视情况而定）一致的价格——的需求曲线更具弹性。

因此，垄断者“并非完全不受限制地影响经济事件的进程”：他不能选择出售特定数量的财货，然后“随意定价”；他也不能确定价格，然后确定将在市场上销售的财货数量（Menger, 1976, 211）。使垄断者“在经济生活中处于特殊地位”的真正原因是他能够在设定固定价格和出售给定数量之间进行选择，而“不考虑其他经济个体”（Menger, 1976, 211）。这种选择意味着垄断者有能力通过限制供应（要么破坏一些已经存在的垄断财货，要么破坏或留下一些未被利用的生产资源在其控制之下）来增加他的经济收益，或者通过破坏一些已经存在的垄断商品，或者通过破坏或将一些未利用的生产资源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然而，门格尔的分析表明，通过扣留一部分已经生产的财货库存来限制自由市场中的供应的能力不能作为区分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标准，因为在不确定的现实世界中，每当他们对未来需求的估计被证明不正确时，**所有企业家**都可以诉诸这种策略（Salerno, 2004, 82）。垄断也不能被定义为**控制**交易发生的价格和数量，因为所有企业家都可以控制他们生产的数量和他们“试图”获得的价格（Rothbard, 2009, 662）。因此，门格尔主义者认为，抽象的纯理论不能建立任何有效的标准来将自由市场价格的任何要素分为竞争要素和垄断要素。市场摩擦、公司的数量和规模、产品差异化、区位优势等方面可能会影响企业家对需求曲线的估计，并且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特定价格更高或更低，或者为什么销售量更大或更小。然而，它们不能作为区分竞争性价格或垄断价格的指南，因为它们没有建立一个概念上不同的市场价格，可以通过纯理论甚至企业家自己来识别（Rothbard, 2009, 699）。

第三，继这两个主张之后，门格尔主义者强调了**潜在竞争在排除自由市场上的垄断收益方面的重要性**。尽管纯理论意义上的垄断力量充斥着偏离完全

竞争的市场经济，但它并不能保护“垄断者”免于实际竞争和潜在竞争（或更准确地说，替代者）的持续存在的力量。门格尔认为，“只要没有社会障碍或其他障碍，对竞争的需要本身就会引发竞争。”这种源自行业内部和外部的潜在竞争，以及由于行业之间普遍存在的可替代性，其作用是“保持对单一生产者财货的需求弹性极有弹性”（Mund, 1933, 122）。Mund (1933, 76) 进一步观察到“所有价格都是由主观评价决定的，竞争的效果只是引起一个不同的供应或一组不同的价格。”对于 J. B. Clark (1907, 381) 来说，潜在竞争在历史上是一种活生生的、不可回避的力量，因为“自从第一批托拉斯（trusts）成立以来，潜在竞争的效率就如此不断地表现出来，以至于这个价格调节器（regulator）永远不会被忽视。”

与克拉克的乐观相反，这一点在其他垄断理论中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这对垄断价格理论的研究方式具有显著的影响。主流讨论开始关注理想化的市场条件，以及关注孤立对待的公司和市场，这抽象掉了（abstract away from）这一事实，即经济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市场和价格体系。这种抽象是一种方法论手段（Knight, 1964, 143），但它故意掩盖了来自行业外部的潜在竞争和跨行业的可替代性在阻止形成垄断上的作用。在主流中，垄断价格的形成是因为摩擦和不完全不允许可替代性（substitutability）像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那样顺利发生。因此，要素流动条件、自然稀缺性、效率差异和产品独特性是垄断价格的决定性原因。然而，对于门格尔主义者来说，在动态市场中形成的所有价格——企业作为竞争性的潜在竞争者面临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都是**竞争性价格**（或用奈特的话来说，“自由竞争性价格”）。行业内外潜在竞争的存在，确保了由消费者自愿决定的需求弹性在阻止企业获得垄断收益。

在发展上述三个论点时，门格尔因此在“作为一种实际条件”的垄断和“作为对自由竞争的社会限制”的垄断之间进行了制度区分（Menger, 1976, 217）。前者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意义上的垄断，例如单一生产者，或 Mund (1933, 115) 所说的“形式垄断（formal monopoly）”，由于潜在竞争作为实际竞争而没有垄断收益。然而，社会限制意义上的垄断可以被称为“实质垄断（true monopoly）”（Mund, 1933, 115）：在这种情况下，潜在竞争受到阻碍或排除，垄断收益变得可行，这取决于具体的制度约束和时间地点的具体情况。因此，门格尔垄断价格理论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主张是，**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之间的区别几乎没有意义。相反，垄断价格在潜在竞争障碍的情况下具有重要意义。**门格尔在他提供的两个垄断供应限制的具体历史例子中强化了这一论点（Menger, 1976, 214–215）：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世纪的行会都是建立在对竞争的法律障碍之上的，而不是作为实际条件的垄断的例子。这种重要的区分在现代垄断分析中丢失了，在现代垄断分析中，在所有偏离完全竞争理想的现实世界市场情况下，垄断收益都是可能的。

然而，门格尔主义者并没有充分探索这第四种洞见——至少直到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穆瑞·罗斯巴德的后期著作。例如，在 20 世纪 20 和 30 年代，大部分门格尔主义著作都集中在公共政策问题和监管改革问题上，特别是与他们自己的理论不一致和无关的问题——包括所有权集中、残酷竞争和价格

歧视，特别是通过交付价格的基点系统（Salerno, 2004）。结果，他们有时未能应用门格尔将垄断视为对自由竞争的社会限制的洞见。⁸

区分竞争性价格和垄断价格仍然是垄断理论和政策的首要任务。然而，对摩擦、技术或稀缺性约束以及其他市场不完全的关注将讨论从一般价格理论的洞见和制度壁垒对潜在竞争的作用转移开来。即使在门格尔主义传统中，后一种洞见及其对垄断分析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尽管如此，这一主张，即对自由竞争的障碍是确定垄断价格的现实的、历史-制度标准，是支撑奈特对垄断理论的贡献的关键线索。

3. 奈特的垄断观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奈特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分在企业家精神研究等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Foss and Klein, 2012, 2015; Hallberg, 2015）。但他对交换和完全竞争的解释在早期的一般经济学文献中受到了最多的关注（见 Emmett, 2020）。然而，奈特的垄断方法（本身）很少受到关注（Raines and Jung, 1988），并且被视为对其更重要的贡献的一次“离题”（Brooke, 2010, 230）。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奈特从未发展出“一个严格的垄断模型……就像他的完全竞争模型那样”（Raines and Jung 1988, 140）：也许是奈特“对静态模型的厌恶”和他对社会改革者滥用该理论的恐惧“阻止了他发展正式的垄断模式”。奈特的沉默也可以解释为他熟悉门格尔的追随者所阐述的垄断价格理论，这种理论在奈特于 20 世纪 20 年代设法解决垄断问题时有着更广泛的认可。⁹这可能进一步阻碍了他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充分发展自己的垄断理论，在这本书中，它主要被用作完全竞争的启发式陪衬。

然而，奈特对垄断的分析值得仔细考虑。与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一样，他无疑熟悉并受到自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主导公共话语的长达数十年的关于垄断、托拉斯和联合体的辩论的影响。然而，奈特还以对现代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的方式，阐明并扩展了门格尔主义者关于竞争性价格和垄断价格之间问题的区分的关键见解。正如我们在下面展示的，奈特使用上面讨论的前两个门格尔主义主张来支持他对垄断的讨论，即垄断价格的形成是一般交换规律的一部分，需求曲线是决定垄断价格的关键因素。然而，为此，奈特在第三和第四个主张中添加了一种更成熟的制度方法，强调强制在识别现实市场中的垄断收益方面的作用，并根据制度因素将垄断分析为一种具体现象或“文化-历史”现象。

只有在他讨论了市场中的其他“不完全”，例如要素不可分割性、邻域效应、效用函数的相互依赖和掠夺性活动之后，奈特才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1964, 174–94）的第 6 章中讨论了垄断。他认为垄断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与完全竞争的理想不完全对应的几种情况之一，声称“所发展的一般原

⁸ Fetter and Mund (1941) 发现自己在用政治反对和政策反对而不是理论术语来对抗新理论。费特认为谢尔曼法案是反垄断政策所有智慧的总和，并相信联邦贸易委员会会执行它。

⁹ 陶西格的教科书（1911）在 20 世纪 20 年代在美国的大学中被广泛使用，并阐述了门格尔的垄断价格理论。奈特对垄断最成熟的分析（[1933] 1965, 90–95）为这一猜想提供了充分的支持。

则的局限性……必须辅以详细的经验数据，然后才能得出完全适用的结论”（Knight, 1964, 174）。¹⁰

奈特接受了将垄断定义为“对商品供应的控制”的通常定义，但对古典经济学家“将控制与供应的自然限制混为一谈”提出了警告（Knight, 1964, 184–186）。他的主要观点是，“对消费财货的垄断”要么可以被视为“单独的生产要素”，是商业资本的独立部分并可以在市场上销售；要么，如果在物理上不能与生产过程分离，则可被视为赋予“生产【该财货】的要素更高的生产力”和差额租金，“高于物理上相同的要素的其他用途”（Knight, 1964, 186）。奈特随后将他的讨论从消费扩展到生产，分析了对一种要素的供应和一种生产方法的“排他性控制”的相关案例（Knight, 1964, 186–90）。他认为，获得任何一种垄断的动机是它赋予“限制某些消费财货的供应”的权力。因此，对他而言，“垄断是不可能的，除非基于对商品生产中必不可少的要素的某种控制”（Knight, 1964, 189）。其次，关于收入分配，“额外产品正确地归属于这一基本要素，或者归属于使控制成为可能的条件，如果与其他情况分开的话。”

在《经济组织》（*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中，奈特将关于垄断和竞争的“问题的关键”确定为不同生产者销售的财货之间的“区分程度”（Knight, [1933] 1965, 91）。每个卖家都拥有自己的身份和商品名——他以该商品名的名义出售他的财货——的垄断权；在大多数市场，尤其是消费财货市场，买家对卖家的独特身份和/或其产品的商品名称并非无动于衷，并在此基础上区分财货。这些数据与根深蒂固的“惯例和习惯”以及昂贵产品和廉价产品之间普遍存在的“互补性”相结合，意味着对几乎所有产品的需求都不是完全有弹性的。不过，对于奈特来说，这只不过是对完全竞争的背离，让生产者“在设定价格方面有或多或少的自由”。但是，尽管福特汽车公司“垄断”了福特汽车，以及 Ivory “垄断”了象牙牌肥皂，潜在的竞争正在阻止垄断收益，因为“否则肯定面临来自其他汽车和其他肥皂的**真正竞争**”（Knight, [1933] 1965, 91；强调为后加）。

此外，奈特敏锐地指出，同类产品（其包含在一个共同的名称下是历史偶然的结果，例如“汽车”或“肥皂”）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所有产品之间更普遍的“替代”现象的部分表现（Knight, [1933] 1965, 91）。在后一种意义上，竞争是“普遍的；在某种意义上，每种商品都有替代品。”“完全替代”对奈特来说只是“完全竞争”的另一个名称，因为在现实世界中，几乎每个生产商都在众多或多或少接近的替代品中出售一种独特的产品。与门格尔主义者一样，奈特将经济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市场和价格体系，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手段-目的框架，其中“产品之间的所有竞争都应被视为替代”（Knight, 1939, 361, fn.1）。因此，给定产品的替代范围最终涵盖了经济中的所有商品，因为“它们都在为消费者的钱而相互竞争”。与完全竞争相反，“完全垄断”只能

¹⁰ 奈特在讨论垄断时使用完全竞争只是作为对比和阐明市场经济运作的辅助构想，而不是作为推断垄断理论的前提。在对垄断竞争模型的批判中，他解释说：“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经济学中的理论与现实或实践之间的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更普遍的理论与适用于现实的形式的理论之间的关系”。（Knight, 1939, 361）。在这一点上，他再次使用了类似于门格尔主义者的抽象方法，但与更主流的理论不同（参见 Long, 2006）。

意味着无法替代的不可能情况：“这样的垄断者必须是法老，将他的臣民的所有权及其所有影响与绝对的政治主权结合起来；实际上，他必须是‘上帝’”（Knight, 1939, 362）。因此，对于奈特来说，“一定程度的垄断，伴随着通过替代进行竞争，【是】最常见的情况”（Knight, [1933] 1965, 90–91）。

奈特讨论了背离完全竞争的两种垄断形式：（1）实现暂时控制一种财货的已有库存的一个市场“角落”，以及（2）“使用商标、商品名或广告标语”加之以“享有盛誉的专业人士的服务”。奈特解释说，这种纯理论意义上的垄断遍及市场经济并与自由竞争无法区分，因为在这些情况下，获取垄断收益的力量受到潜在竞争的制约：“每个垄断显然都有竞争”（Knight, 1946, 85），也就是说，“与其他型号或品牌的竞争是一种或多或少相似的财货的替代情况，也是一个垄断者总是必须考虑的”（Knight, 1964, 186）。奈特对自然垄断的重视程度同样不高（Knight, [1933] 1965, 93），甚至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都没有提到它，将其与需要大量固定投资——其重复会导致浪费——的公共事业联系起来。这些不是不公平（或非自由）竞争的系统性结果，而是自由竞争下由于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摩擦、不完全和其他无处不在的限制而自然发生的结果。

替代的普遍性（尽管在存在约束和摩擦的情况下并不完全）使奈特得出这样的结论：需求弹性是对垄断力量的程度（即现实经济中的“设定价格的能力”）的“检验和衡量”（Knight, [1933] 1965, 91）。因此，奈特明确排除了偏离完全竞争的理想作为垄断价格出现的必要或充分条件。他的论点（Knight, 1933 [1965], 91）暗示，一个高于自由市场价格的充分——尽管不一定是完全的——弹性需求曲线将使供给限制无效，即使存在可以作为自然进入壁垒的不完全或摩擦。他的分析可以追溯到门格尔，表明如果垄断者的需求曲线在自由市场价格之上的弹性如此之大，以至于随着价格的上涨，总收入的下降速度快于总成本的下降速度，那么垄断者限制供应将不会使垄断者获利。因此，对于奈特和门格尔主义者来说，垄断是一种交换现象，而垄断理论关注的是“不完全的”（即真实的）市场，其中在普遍存在的摩擦下，几乎所有企业都面临着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和潜在的竞争。

对奈特来说，获得垄断收益关键取决于潜在竞争的存在，以及公司产品的需求曲线的弹性。奈特将这一观点精辟地概括为一个具有批判性和先见之明的评论，一个门格尔主义垄断价格理论的概要：

供应部分的所有者是否可以通过不使用某些该部分来获得收益，将取决于他所持有的供应比例以及从竞争来源获得的供应灵活性【即潜在竞争】以及产品需求的弹性（Knight, 1964, 193, fn.1）。

奈特得出与门格尔相同的结论：就一般交换理论而言，“垄断和竞争之间没有界限”（Knight, [1933] 1965, 91）。此外，如果“在垄断和竞争条件下，价格都取决于生产和销售的数量，垄断者控制价格的唯一方法是限制供应”

（Knight, [1933] 1965, 95），这导致了这样的结论，即价格理论无法从“所有利润都是垄断利润”的自由市场上识别或区分出“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

格”（Knight, 1939, 363）。Knight (1964, 184) 特别承认，“从分配的角度来看，所有收入都取决于生产它的要素的稀缺性，而且方式完全相同。”因此，将来自生产要素稀缺性的收入描述为“垄断收益”只是“毫无意义”。他补充说：“**在自由竞争下**，无论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都不存在其他形式的收入”，在这些条件下，“这一指称【即垄断收益】既不区分也不以任何重要的方式描述任何东西”（Knight, 1964, 184; 强调为后加）。

尽管如此，即使在“所有商品为消费者的钱而相互竞争”的动态世界中，奈特的进一步贡献在于，通过识别可能导致垄断价格从汹涌的替代竞争海洋中出现的制度-历史障碍，来区分**垄断价格**和**自由竞争性价格**（Knight, [1933] 1965, 91）。与门格尔一样，奈特声称，一个企业“被认为”垄断，如果“它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即能够收取的价格高于其他人在**不受某些特殊障碍阻止的情况下**可以收取的价格”（Knight, [1933] 1965, 91; 强调为后加）。这些特殊障碍可能会在重大的意义上创造垄断：与造成市场不完全的固有条件不同，壁垒可以限制潜在的竞争并使垄断收益成为可能。对奈特来说，这些是社会设计的制度约束，通过阻止自愿交换、排除潜在竞争和强制降低需求曲线的弹性来改变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经济互动。

奈特指出了另外两种不同于上面讨论的垄断：第一，“生产或销售某种商品的专有合法权利”，如“专利消费品”中的例子，奈特将其与垄断的原始含义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或“合法”垄断。他专门对专利进行了冗长的讨论，其中他对这种特权的可行性和公平性提出了质疑；一方面，他认为原创想法和生产过程的专利为“实验和开发提供了动力”（Knight, 1999, 200）。另一方面，他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发展问题，以提供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奖励这些服务，而不是暂时垄断它们的使用”（Knight, 1964, 188）。虽然奈特没有对专利授予的福利影响做出明确的判断，但他在分析中确实将其与第二种垄断密切相关，即其他形式的“不公平竞争……”，因为它们助长了“当地低价销售、抵制的威胁”等等。即使没有得到国家的正式制裁，私营企业的这种威胁和阴谋也是对产权的强制性侵犯。奈特将它们等同于“控制他人或其个人拥有的财产的声音；也就是说，把所有权分开了”（Knight, 1964, 185）。

由此，他在自由竞争下的价格和垄断下的价格之间做出了鲜明的制度区分，如下所示：

当然，自由竞争涉及对每个生产要素或自然单位的完全的、单独的所有权，以及以确保其最大价值收益的方式利用每个要素或单位。任何形式的**对竞争的暴力干预**都显然与这一假设相矛盾，并且可以被粗略地称为垄断（Knight, 1964, 185; 强调为后加）。

奈特在其作品中提供了几个暴力干涉自由竞争的例子，包括工会和农业卡特尔，以及企业的政治寻租。¹¹在新政下围绕监管的制度现实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后，奈特进一步关注由强制性法律障碍或其他法律制度措施造成的垄断的反竞

¹¹ 奈特的暴力案例不应该被理解为他认为所有的工会或卡特尔本质上都是强制性的：他的观点似乎是基于他观察到的实际暴力案例。我们感谢一位匿名审稿人强调了这一区别。

争和错误分配效应。奈特解释说：“对垄断的普遍批评确实被夸大和误解了。大多数垄断实际上是相对暂时的。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垄断无疑是一种真正的罪恶，并提出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Knight 1946, 85）。

奈特认为垄断的这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是强制性公共行为限制潜在竞争的结果，而不是像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这样简单地背离完全竞争。在这一点上，奈特将“市场经济的机械不完全，真正的不完全”（如摩擦或自然约束）与“由愚蠢或不明智的公共行为造成的”不完全（这使得商业利益“通过作为压力团体的政治行动，变得对自由社会更加危险”）进行了对比（Knight, 1999, 380）。我们将在下一节中扩展这种区别。

4. 强制制度与垄断发展

Hudik and Bylund (2021, 1)认为，奈特“提倡在经济学的理论和历史主义方法之间采取‘中间道路’”，从而在经济原则和历史特殊性之间取得了成功的平衡——迄今为止，无论是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还是制度主义的方法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通过强调奈特对制度历史的探索是理想经济理论与要解释的具体的、复杂的现实之间不可或缺的联系，我们对奈特垄断方法的分析证实了这一观点。

在这一努力中，奈特再次与门格尔达成了一致。门格尔的“历史观点”（1963, 79）试图定义如何将经济理论应用于经济生活的多方面现实（Garrouste, 1994），而奈特则认为满足纯理论形式范畴的经济数据必须取自制度历史，“所有这些东西，与市场关系本身的非个人系统一样，显然都是**文化-历史事实和产物**”（Knight, 1964, xii; 强调为后加）。因此，用埃米特的话来说，奈特敦促经济学家“简单地接受门格尔和奈特重构过的经济理论，尽管它有局限性”（Emmett, 2013, 122）就不足为奇了。奈特平衡纯理论和制度历史的方法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奈特和门格尔主义者认为，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之间的区别不能通过纯理论独立地建立起来，因为“我们无法独立地将‘竞争性价格’定义为不同于自由市场价格”（Rothbard, 2009, 697）。然而，奈特的分析进一步发展了门格尔观点的细微差别：对垄断价格的经济解释必须辅之以对制度在垄断发展中的作用的解释。因此，通过证明垄断-竞争性价格差异只能在框架和约束现实世界交换的制度事实和条件中发现，奈特填补了门格尔方法的一个空白。¹²

在这种情况下，强制被定义为对人身或财产的暴力干涉或威胁，而自由竞争则在尊重并执行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时获得（Méra, 2010; 另见 Rothbard, 2004, 84–102）。奈特认为垄断和强制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并认为后者在解释垄断方面具有定义性作用。例如，奈特接着详细讨论了法律和私人强制（1999, 15–16），并分析了垄断。在这方面，他使用了垄断的经典定义，即“一种强制

¹² 尽管奈特没有详述历史细节，但除了他的理论观点外，他对垄断价格的实用方法很可能受到美国数十年来关于垄断、竞争和反托拉斯政策的辩论的影响。我们感谢一位匿名审稿人向我们指出这一点。

权力形式，在‘自由’状态下是不可接受的。”奈特的见解是，解释垄断和垄断收益产生的关键因素是制度条件从自由竞争到暴力干预竞争的变化，无论是通过垄断授予和特权，还是通过私人胁迫。这些条件使控制生产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成为可能，从而也获得了垄断收益。对潜在竞争的暴力干预可能使需求曲线在市场价格之上缺乏弹性，从而影响企业的选择集和垄断定价的可行性，因为消费者无法通过自愿交换替代其他潜在竞争者的产品（Rothbard, 2009, 904）。

与更主流的垄断观点不同，这提供了自由市场价格和垄断价格之间独立的理论区别，并且，奈特的条件“可以与”控制供应并因此可能获得垄断收益的“其他情况分开”（Knight, 1964, 189）。相比之下，作为其他垄断价格理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的摩擦或不完全，与需要解释的复杂现实密不可分。充其量，它们可以有助于解释不同的（竞争性）价格是如何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通过企业家决策形成的。但是在自由竞争下，由于潜在的竞争，需求曲线总是在市场价格之上具有弹性，因此在这些条件（不管完全或不完全）下区分竞争性价格和垄断价格是站不住脚的。在这方面，门格尔-奈特方法也满足了 SCP 理论对真实性和可观察性的要求。虽然实际需求和成本曲线的形状和位置无法确定（Mason, 1939），但在市场上使用强制手段，特别是通过授予法律特权，是可以观察到的，并且可以作为垄断价格和（更广泛的）福利分析的基础（Armentano, 1988; Rothbard, 1956）。

13

在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背景下，对自由竞争的强制性干预的最常见方式是通过创造竞争的政治壁垒（例如垄断授予）和通过有利于某些公司而不是其他公司的监管特权。制造这种障碍的权力主要由各州拥有，并通过各级政府的立法和监管机构制定，通常是通过合法的财产权（Barzel, 1994, 1997）。强制性壁垒可以限制潜在的竞争，可能会导致垄断价格。因此，在实践中，获得垄断收益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环境以及制度（比如国家）的规模和范围。虽然摩擦或不完全等其他因素可能会导致自由竞争下的不同需求弹性，但只要制度环境涉及买卖双方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自愿协商价格，这些因素就不是垄断性质的。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价格是这个意义上是“竞争性地”决定的：因为潜在竞争存在并充当实际竞争，并且在消费者和生产者认为合适的情况下提出和拒绝报价。在这种情况下区分竞争和垄断不仅仅是一个定义问题，而是一个涅槃谬误：它意味着比较由于摩擦和不完全而产生的“不完全”价格和没有摩擦的不可能的、“完全竞争”的价格（Foss and Klein, 2012, 56, 64, fn.16, 141–142）。¹⁴

¹³ 在某种程度上，对强制的关注预示了后来的贡献，例如 Barzel (1994) 的观点，即垄断地位意味着对他人造成伤害的经济权利，尽管他对什么造成伤害的观点不同于最近的门格尔主义文献——如 Rothbard (2009) 和 Salerno (2004)——所提出的观点。垄断定价的范围将取决于什么算作需求曲线的强制变化。

¹⁴ 通过承认市场摩擦的普遍性，奈特主义和门格尔主义方法提供了“假设的对称”，也就是说，它将相同的假设应用于不同理论领域的所有行动者和相互作用（Foss and Hallberg, 2014）。这是重要且必要的，因为通常是交易成本研究而不是价格和生产理论最强调摩擦（Langlois and Foss, 1999）。门格尔主义的观点消除了这种不平衡。

更重要的是，虽然强制条件下的需求弹性低于自由竞争条件下的需求弹性，但纯经济理论无法确定这是否必然导致垄断收益。只有“具体的历史数据”才能表明需求弹性的下降是否使公司的需求曲线在自由竞争性价格之上的弹性足够小（Rothbard, 2009, 904）。一方面，通过法律特权进行强制会减少消费者的选择（例如在保护性贸易壁垒的情况下），但如果不能充分限制选择以使需求曲线缺乏弹性，则可能不会给企业带来垄断收益从而使公司能够以高于自由竞争性价格的价格获取更高的总收入。在某些潜在竞争受到阻碍但并非完全排除的情况下（例如贸易壁垒），拥有此类特权的企业可能会选择不降低产量或提高价格。另一方面，如果工会是强制性的，那么强制就必然限制市场上劳动力的总供给，排除潜在的竞争，带来高于自由竞争的价格，从而获得垄断收益。奈特对潜在竞争的理解让他意识到了这些细微差别。例如，他批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保护性【贸易】关税创造垄断”（Knight, 1999, 452, fn.11），并迅速补充说他们只是“促进”而不是确定性地导致它。同时，他很快指出，“垄断真正产生不良影响的地方是由有组织的工薪者和农民构成的真正强盗……任何像全国范围内的集体谈判和罢工这样东西，都是对国家的强制”（Knight, 1999, 380）。

还要注意，垄断所获得的收益可能直接归因于它所享有的特权，即限制使控制成为可能的潜在竞争（Knight, 1964, 189），然后只能间接归因于生产性资产所有权的垄断。垄断收益直接是强制性特权的结果，因此也是使特权成为可能的制度环境的结果。这种观点认为，制度通过塑造游戏规则、政策菜单和垄断定价的可行性来直接影响垄断和竞争，而不是简单地影响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或者引入或改变市场摩擦系统。

在国家范围之外，强制性权力可以由私人机构行使，例如有组织的宗教（奈特最喜欢批评的目标之一）或其他有影响力的团体，只要他们的治理方法足够有力。由于缺乏系统的干预措施，例如个人或非正式团体使用简单的武力或欺诈，需求弹性也可能被强制降低。再一次，仅凭经济分析并不能说明这些行为是否一定会导致垄断收益，因为它们的影响总是取决于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条件下高于自由竞争性价格的企业的需求曲线的弹性。

这些行动可能导致的任何垄断价格也是制度设置的直接后果：在私人行动的情况下，就是弱制度对合同执行的直接后果。历史分析可能表明，由于弱制度而导致的这种私人强制更有可能受到潜在竞争以及产权等基本法律制度的执行的制约。这本身就是一个竞争过程。事实上，巴泽尔认为，垄断应该被认为是对贸易收益的经济产权（事实上的控制）的竞争（Barzel, 1994, 408）。消费者有权提高垄断成本并使其失去吸引力。仅举一个例子，“长期合同和其他事先承诺通过消除有害行为的机会来防止潜在的垄断者捕获”（Barzel, 1994, 408; 还有 393）。私人强制更有可能发生在合法产权的边界之外，因此不属于国家的执法权力范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过程可以被看作是私人通过重新分配经济产权并使它们与合法产权保持一致来解决政府失灵的一种方式。无论如何，关键是对这些案例的历史研究必须关注那些——在允许或不允许对需求弹性进行强制性修改的意义上——创造或消除垄断收益的制度。

前面的讨论有助于表明奈特所设想的垄断价格理论的适当位置：在可能阻碍或排除潜在竞争的不同制度背景下，需求曲线的弹性如何受到影响，价格理论才可能阐明关于垄断的政策讨论。制度-历史分析的进一步任务是解释这些条件在特定情况下是否会导致垄断，并为进一步的政策建议提供信息。这种解释也为奈特早期对不完全竞争“狂热”的反对提供了新的启示：

出于理论本身或将其应用于政策的目的，我看不出可以用它做多少事情。在有用的经济分析和单纯的谜题制作和解答之间，总是很难说在哪里划清界限或达到平衡。在最近的文献中，后者有很多（Knight, 1939, 362）。

他将这些理论称为“单纯的谜题制作和解答”的驳斥，也适用于目前为立法者制定竞争政策提供信息的广泛现代研究。如果对自由竞争下的摩擦和不完整的分析不能作为理解垄断价格的标准，那么它就不能作为健全的公共政策的指南。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奈特会反抗这些理论，其“革命新奇的气氛……不仅不符事实，而且对我们的科学和制定健全社会政策的希望——已经足够暗淡了——造成了巨大的损害”（Knight, 1939, 362）。

奈特对公共政策的悲观态度也源于他的政治怀疑态度。他不信任立法者的动机，怀疑他们处理竞争和垄断的能力（Raines and Jung 1988, 139）。奈特经常对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表示怀疑，称其不确定，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是那么隐晦。他熟悉这一经典立场，即“在没有国家本身的积极支持、援助和教唆的情况下”，垄断“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出现”（Knight, 1999, 15），但他不愿完全排除纯粹由于私人强制而产生和发展的垄断的可能性：

这确实仍然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作者对此并没有非常积极的看法，但在这个问题上，他绝不像冯·米塞斯教授和罗宾斯教授那样乐观……但是，必须承认，在可见的未来，政府从未对最初的自由主义立场给予任何公平的审判，而且似乎也不会这样做（Knight, 1999, 16）。

同时，他也不相信政治强制——甚至仅限于政府的纠正行动（或他所谓的“强制性抑制”）——可以有效地限制私人干预对自由竞争的影响，警告改革者认为“只要自由产生了不受欢迎的结果，就应该废除它，取而代之的是官僚控制……是理所当然的”（Knight, 1939, 366, fn.6）。事实上，奈特对垄断的分析表明，将摩擦和不完全作为垄断价格决定因素的现代理论不仅无法为政策干预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往往会带来模棱两可的结果，要求通过强制手段解决市场不完全，或者节省因摩擦而产生的成本。他的方法表明，强制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政策不仅不会减少垄断收益，反而会降低需求弹性并阻碍潜在竞争，使市场不仅远离完全竞争的无法实现的理想，而且也远离自由竞争。

5. 结论

奈特关于垄断的观点突出了三个值得修正的见解：首先，制度分析必须补充经济理论来理解垄断的存在和发展。纯经济理论在概念上或实际上无法区分

竞争价格和垄断价格，“文化-历史事实”必须在识别垄断收益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将垄断研究重新定位到这个迄今为止被忽视的奈特主义方向，可以帮助学者们在寻找更有意义的政策建议理论基础时避免摩擦和不完全等误导性概念。其次，这一见解对门格尔主义者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他们在一般理论和特定制度环境中理论的具体历史应用之间进行跨越时，对垄断和其他概念的分析可能会有所不足（Hodgson, 2019）。第三，对于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来说，奈特对垄断的贡献勾勒出了这种知识遗产和发展的更加细致入微的画面，受到门格尔主义传统和从他的制度研究中获得的见解的双重影响。

门格尔主义者（如费特和蒙德）在垄断价格的斗争中输给了垄断竞争理论之后，奈特在美国经济学界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影响力。然而，尽管他是一名经济理论家，但奈特对垄断的制度方法也未能在由完全和不完全竞争模型主导的研究领域产生影响。现在，距离《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出版已有一个世纪，当代主流的垄断研究几乎没有什么见解可以提供给那些偏爱丰富的制度分析而不是狭隘、抽象的经济方法的学者。然而，市场是一系列活生生的行动、规则和制度，严格的理论必须通过制度分析实现向实践（和政策）的飞跃。仅举一个例子，在反垄断政策对主要科技公司越来越激进之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摆脱完全和不完全竞争，从分析孤立的公司和市场转向因果-现实主义方法来理解价格和现实世界垄断的政治监管基础。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复杂的理论讨论在短期内可能无法承受来自政策圈子的权宜之计或政治利益的压力。然而，揭示经济原理的真相和局限性，以及它们与制度的不可磨灭的联系，并不是一项徒劳无益的任务，其有用性仅根据其对政策的直接影响来判断。与制度一样，正确的理论对政策的影响可能很慢，但这一切都不会影响其重要性，也不会影响将其从经济思想史中恢复过来的重要性。

像 Knight (1964, xxxvi) 一样，我们认为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少数人会吸取教训并将其带到另一个历史关头，那时候热爱真理和正义的‘其他人’（毕竟，同样是人类）……可能会再次获得机会。”我们希望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两百周年的时候，我们能够回顾由门格尔和奈特的工作塑造的垄断价格研究和政策。

参考文献

Armentano, D.T., 1988. Rothbardian Monopoly Theory and Antitrust Policy, In W. Block and L.H. Rockwell Jr. (eds.) *Man, Economy and Liberty: Essays in Honor of Murray N. Rothbard*, 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pp. 3–11.

Asso, P.F. and Fiorito, L. 2008. Was Frank Knight an Institutionalism?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 pp. 59–77.

Bain, J.S. 1972. *Essays on Price Theory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 Barzel, Y., 1994. The Capture of Wealth by Monopolists and the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14(4), pp.393–409.
- Barzel, Y., 1997.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sanko, D., Dranove, D., Shanley, M. and Schaefer, S., 2017. *Economics of strategy*. 7th edition, John Wiley & Sons.
- Bickenbach, F., Kumkar, L. and Soltwedel, R. 1999.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f Antitrust and Regulation, Kiel Working Paper No. 961, Kiel: Kiel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 Boettke, P.J. and Vaughn, I.K. 2002. Knight and the Austrians on Capital, and the Problem of Socialism.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4 (1), pp.155–176.
- Böhm-Bawerk, E.v. 1962. “Control or Economic Law.” Trans. John Richard Mez. In *Shorter Classics of Eugen von Böhm-Bawerk*. South Holland, IL: Libertarian Press, pp. 139–99. Brooke, G., 2010. Uncertainty, Profit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on: Frank Knight’s Contribution
-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32(2), pp. 221–235.
- Chamberlin, E.H., 1949.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 re-orientation of the theory of valu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lark, J.B. 1907. *Essentials of Economic Theory: As Applied to Modern Problems of Industry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 Cohen, A.J. 2003. The Hayek/Knight Capital Controversy: The Irrelevance of Roundaboutness, or Purging Processes in Tim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5 (3), pp.469–490.
- Dixit, A.K. and Stiglitz, J.E., 1977.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3), pp.297–308.
- Emmett, R.B., 2006. De Gustibus est Disputandum: Frank H. Knight’s Reply to George Stigler
- and Gary Becker’s ‘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 with an Introductory Essay.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13(1), pp.97–111.
- Emmett, R.B., 2007. Knight’s challenge (to Hayek): spontaneous order is not enough for governing a liberal society. In *Liberalism, Conservatism, and Hayek’s Idea of Spontaneous Order* (eds. Louis Hunt and Peter McNamar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p. 67–86.

Emmett, R.B. 2009. Did the Chicago School Reject Frank Knight? Assessing Frank Knight's Place in the Chicago Economics Tradition. In Emmett, R.B. (ed.), *Frank Knight and the Chicago school in American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pp.145–55.

Emmett, R.B. 2010.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by Frank Knight: A Reader’s Guide.” In Emmett, R.B. (ed.), *The Elgar Companion to the 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pp. 52–58.

Emmett, R.B. 2013. Frank H. Knight on Institutionalism and Economics.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31b, pp.117–124.

Emmett, R.B. 2015. Frank H. Knight and the Chicago School (October 5, 2015). ASU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 Liberty Research Paper.

Emmett, R.B. 2020. The Writing and Reception of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August 17, 2020).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Special Issue on Frank Knight's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 J. M. Keynes' Treatise on Probability.

Fetter, F.A., 1937. Planning for Totalitarian Monopol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5(1), pp. 95–110.

Fetter, F.A. and Mund, V. 1941. Duopoly Theory versus Antitrust Polic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Frank A. Fetter mss., 1875–1988. Lilly Library,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Box 9, Folder: Unpublished writings: 1898–1943 and undated.

Friedman M. 1953.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Foss, N.J. and Hallberg, N.L., 2014. How symmetrical assumptions adv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5(6), pp.903–913.

Foss, N.J. and Klein, P.G., 2012. *Organizing Entrepreneurial Judgment: A New Approach to the Fi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ss, N.J. and Klein, P.G., 2015. Introduction to a Forum on the Judgment-Based Approach to Entrepreneurship: Accomplishments, Challenges, New Direction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11(3), pp. 585–599.

Garrouste, P. (1994). Menger and Hayek on Institutions: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6(2), pp.270–291.

Greif, A. (2005). Commitment, coercion, and markets: The nature and dynamics of institutions supporting exchange. In C. Menard and M. Shirley (Eds.) *Handbook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Boston, MA: Springer, pp.727–786.

- Hallberg, N.L. 2015. Uncertainty, Judgment,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11(3), pp.623–650.
- Hodgson, G.M., 2001. Frank Knight as institutionalist economist. In J. E. Biddle, J. B. Davis, & S.G. Medema (Eds.), *Economics broadly considered: Essays in honor of Warren J. Samuels*, London: Routledge, pp. 64–93.
- Hodgson, G.M. 2019. Austrian Economics is Still Not Institutional Enough, *Advances in Austrian Economics*, 24, pp. 101–110.
- Hudik, M. and Bylund, P.L. 2021. Let's do it Frank's way: general principles and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the study of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pp.1–16.
- Joskow, P.L., 1991. The Role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in Antitrust and Public Utility Regulatory Policies. *Th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7 (Special issue), pp.53–83.
- Knight, F.H. [1933] 1965.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 Knight, F.H. 1937. Letter to Frank A. Fetter, dated 25 February. Frank A. Fetter mss., 1875–1988. Lilly Library,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Box 2, Folder: Correspondence 1937, Jan.–June.
- Knight, F.H., 1939. Imperfect competi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3(4), pp.360–366.
- Knight, F.H., 1946. The Sickness of Liberal Society. *Ethics*, 56(2), pp. 79–95.
- Knight, F.H. 1950. Introduction. In Carl Menger,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Tr. James Dingwall and Bert F. Hoselitz, Glencoe, IL: Free Press, pp. 9–35.
- Knight, F.H., 1964.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 Knight, F.H., 1999. *Selected Essays by Frank H. Knight, Volume 2: Laissez Faire: Pro and Con*, R.B. Emmett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glois, R.N. and Foss, N.J., 1999. Capabilities and governance: the rebirth of production in the theory of the firm, *KYKLOS*. 52(2), pp.201–218.
- Long, R.T., 2006. Realism and abstraction in economics: Aristotle and Mises versus Friedma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9(3), pp.3–23.
- Mason, E.S., 1939. Price and production policies of large-scale enterpris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9(1), pp.61–74.

- Mäki, U., 2004. Theoretical isolation and explanatory progress: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d the dynamics of disput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8(3), pp.319–346.
- Menger, C. 1963. *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trans. J. Dingwell and B.F. Hoselitz,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Menger, C. 1976.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Tr. J. Dingwall and B.F. Hoselitz. New York: 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
- Monteiro, G.F.A. and Foss, N., 2018. Resources and market definition: Rethinking the “hypothetical monopolist” from a resource-based perspective.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39(3), pp.346–353.
- Mund, V.A. 1933. *Monopoly: A Theory and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North, D. N.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teraf, M.A. and Bergen, M.E., 2003. Scanning dynamic competitive landscapes: a market- based and resource-based framework.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4(10), pp.1027– 1041.
- Raines, J.P. and Jung, C.R., 1988. Monopolies as “Mechanical Defects”: Frank H. Knight on Market Powe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0(2), pp.135–143.
- Rothbard, M.N., 1956.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Utility and Welfare Economics. In M. Senholtz (ed.) *On Freedom and Free Enterprise: Essays in Honour of Ludwig von Mises*,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pp. 224–262.
- Rothbard, Murray N., 2009. *Man, Economy, and State with Power and Market*, 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 Salerno, J.T., 2003.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Monopoly Price: From Carl Menger to Vernon Mund, South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Conference, November 21–23.
- Salerno, J.T., 2004. Menger's theory of monopoly price in the years of high theory: the contribution of Vernon A. Mund. *Managerial Finance*, 30(2), pp.72–92.
- Stigler G.J., [1949] 1983.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in retrospect*. Reprinted in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Stigler, G.J., 1957. Perfect competition, historically contemplate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5(1), pp.1–17.

Taussig, F.W., 1911.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New York: Macmillan.

Tirole, J., 1988.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Tsoufidis, L., 2009. The rise and fall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56(1), pp.29–45.

Yu, T.F.L., 2002. The Economics of Frank H. Knight: An Austrian Interpretation. *Forum for Social Economics*, 31(2), pp. 1–23.